写出军旅经验的温度和触感

——关于文清丽小说创作的笔谈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朱向前：2017年至今，在近4年的时间里，军旅女作家文清丽每年都有10个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约30万字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大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仅以2019年为例，文清丽就密集推出了1部长篇小说《爱情底片》；3个短篇小说：《哈雷彗星》《星球上的时光》《二十一分三十五秒》；7个中篇小说：《咱那个》《两只忧伤的老虎》《你不是尹雪艳》《耳中刀》《女兵们，正步走》《手之语》《地球上的泪滴》等。从这些聚焦强军兴军伟大实践和军旅生活现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文清丽的创作并不囿于个人经历或一己悲欢，而是题材多样，四面出击，正面强攻；并且，更加注重对特定情境下军人内心世界的深层次、多向度挖掘，刻录下鲜活、扎实、生动的时代印记。

在军旅题材之外，文清丽至少还创作了3个系列：都市题材中篇小说系列——《黄金时代》《鱼什么都知道》，等等，或用访谈结构全篇，或用多人称进行讲述，在形式内容上都不乏探索；疾病题材中篇小说系列——《采葑采菲》《你不是尹雪艳》《她骑着小桶飞走了》《地球上的泪滴》，等等，与疾病书写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是对人性空间的体察与勘探；戏剧题材中篇小说系列——《挑滑车》《宇宙锋》《凤还巢》《好花枝》，等等，描述的都是戏曲艺术家的情感生活，展示出一种较为新鲜独特的小说面相。

文清丽还是一个文学故乡的深情守护者。尤其是，当她郑重地捧出长篇小说新作《光景》时，我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她迄今最具分量与质地的作品。小说以某村王氏家族50年的生活变迁为主线，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事件巧妙地融入凡人小事中，深情隽永地唱出了西北乡村生活的一曲信天游。

《光景》以小女孩灵灵的视角来讲述家人的故事，作者既是叙事者，又是故事中人，有了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作者就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拓宽了读者的想象，也因此形成了全书引人注目的三个特点。一是独特的人物形象。小说主人公“姑姑”的形象与众不同，是一个美丽的悖论，是一个爱情的错误，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乡村女性典型人物。小说其他人物如叔叔、婶婶、妈妈、爷爷等，文清丽也写得一丝不苟，形神盎然，笔笔见功力，读来让人印象深刻。二是浓郁的地域风情。描写浓郁的地域风土人情，还原西北乡村的日常生活，是文清丽的一个重要追求。因为全身心地浸淫在故乡的回忆中，文清丽笔笔动情地写下纺线织布、磨米晒粮，挑水砍柴，喂猪放羊，再加上秦腔戏、臊子面、血条汤、御面等风物饮食，给身处黄土高原的主人公们提供了有滋有味、可触可感的人生舞台。三是鲜活的语言风格。不管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抑或是描写语言，文清丽在小说中着重把握了一个度，就是和人物、和景致、和风情要贴，也就是接地气，从塬上地底里长出来的，土得掉渣，但有生气，有韵味，有情致，方言俚语中透出一股子古气，典雅而传神。文清丽以短促和简省的方言土语写人、抒情、状物，字里行间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更使作品氤氲上一层浓浓的陕北地域特色。说到语言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清丽握有几副笔墨，写军旅生活的文字自带金石气，不乏金戈铁马之声；《光景》一路以土为特色，而“昆曲系列”则以雅见长，某些缱绻悱恻、华丽婉转的段落几乎就和昆曲戏文一个调调了。也就是说，文清丽的语言资源比较丰富。她的小说可资熔铸的空间还很大，前景可期！

傅强：向前老师对文清丽近期的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概括，我主要就长篇小说《爱情底片》谈谈阅读感受。《爱情底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面对生活也都有难以言说的秘密。在赋予他们智慧、美貌、才华与优雅等不同特点的同时，文清丽又将每个人物的狭隘与无奈展示出来。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个体，也承受着生活的重荷，他们的选择也是我们在生活与事业上所要面临的，这种真实和熟悉让人心生怜惜。从人物的成长际遇中，读者又能看到时代的变迁，领略生活的粗粝及人物内心的幽微。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底片》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情感挽歌，亦是一部女性情感成长和成熟的心灵史诗。

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关于军旅生活的描写。在远离闹市的部队营区，生活着一群生气勃勃的军人，还有他们可爱的来队军嫂们。生活虽然平淡质朴，但那单纯而温情的日子，宛若悠远的笛声，把家长里短和真挚情感撩拨得生动起来。既烘托了军营生活的美好，又给作者自己和读者以期许，相信世间总有一处纯净的天空，留得下所有清澈的想象。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饱满，文清丽采用了一种讨巧却也恰切的方式——用主人公的作品、书信和日记剖析其复杂的情感和烦乱的思绪，隐晦的留白和零星的信息埋下层层伏笔；用“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揭开面具背后隐藏的人性，反衬出主人公的纯真品性；引用不同人前后矛盾的说法，检视“社会底片”下的芸芸众生。那是一种青春的怀念，是过尽千帆后的眷恋，是一则余韵悠长的寓言，让读者触摸到岁月的质感，审视流年中那些不曾忘却的灵魂。

《爱情底片》的叙事并不围绕一个完整的中心故事或核心的戏剧冲突展开，而是以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分别描摹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在共同社会环境和生活逻辑中的迥异遭际，在大量细节构成的生活流态中，展示人物命运轨迹的自然流淌、变形、反转的动态过程。在《爱情底片》中，文清丽试图建构起一则关乎军人、知识分子灵魂内省，关乎时代精神思辨的寓言。

文清丽：每每下部队，我都有一种重新当兵的感觉。前阵子去火箭军某部采访“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沙子呷，这是我第一次到火箭军工程部队。官兵们一身迷彩，头戴红色的安全帽，头发、鼻孔、耳朵里填满了沙粒。他们没有固定的营房，常年在洞库里闻着厚重的粉尘，忍受着高温度作业。辛苦不说，有时还会遇到塌方等险情。我感同身受着他们生活和工作条件之艰苦，可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却从不叫苦。他们在强军征途上的感人故事有很多很多，可反映这种鲜活的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我深切地感觉到，作为军旅作家，身上的责任很重。我心中有一个夙愿——要写女航天员、女坦克手、女舰长等女军人系列作品。女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军人职业的独特和荣光，这都是我近年来痴迷写女军人的原因。

随着改革强军进程的不断深入，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豪气。我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依然能够战斗。我无法停下自己的文学脚步，总感觉有一个个官兵在看着我。作为军旅作家，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写好他们。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我渴望感受金戈铁马的大气磅礴，愿意诚实地去听，去看。哪怕是军营里的一块石头，我相信它也是有温度的。我正是要努力书写军中岁月的肌理与质地，写出军旅经验的温度和触感，描摹出时代鲜活而坚实的印记。

发掘《史记》战争人物的精神追求

——韩兆琦新著《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读后

■陈　曦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兆琦在《史记》研究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60余年，代表作有《史记选注集评》《史记通论》《史记笺证》《史记题评》等。他的新著《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2020年年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便很快登上了《中华读书报》的月度好书榜。该榜单评介道：“本书按《史记》原书篇章顺序，逐篇进行讨论，或谈对《史记》所记史事、人物和言论的体会感悟，或剖析司马迁史料处理和写作方面的成败得失，或根据相关文献、后世研究及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对司马迁的记述进行补充、提出新解，或就《史记》通行版本中的某处文字、标点进行商榷，等等，很多论述极具启发性，值得《史记》研究者、爱好者关注。”由此可以窥见这部新著论述内容的丰富多彩。据统计，《史记》全书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与军事活动相关。韩兆琦对《史记》战争人物的研究和评析为人们探究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提供了重要借鉴。韩兆琦一贯致力于揭示《史记》战争人物的“中国心”“民族魂”，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乃天下盛德之大业！”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爱国主义，“精忠报国”历来被视为中华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价值。对《史记》不同历史时期战争人物拯救国难、舍身报国的感人事迹，如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信陵君的“窃符救赵”、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等，韩兆琦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深刻点评。在评价《史记》战争人物的历史贡献时，他把是否以国家利益为重，视为一条十分重要的衡量标准。比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平原君，平素喜好养士却见识平庸，并无识才慧眼。但在秦国大军包围邯郸、各国救兵尚未到达的危急时刻，他能从谏如流，采纳了李同的建议，将自己的全部家财拿出来犒军，将自己的家人也编入士兵队伍，誓与邯郸共存亡。对于平原君的不惜牺牲家族利益以徇国家之急，韩兆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是“通达事理，忠于国家”的；而对说服平原君破家为国的李同，韩兆琦更是叹赏不已。李同身份卑微，不过是“邯郸传舍吏子”，但在“邯郸急，且降”的紧要关头，他不惧强秦，积极有为。在说服平原君破家为国、鼓舞了赵人士气以后，他组织了三千人的义勇队，迎头痛击强秦，“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从而赢得了时间，等来了楚魏援军。李同与侯嬴、朱亥、毛遂等人类似，均为司马迁所倾心歌颂的小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平原君、信陵君那些贵族公子们或将一事无成。而在上述小人物当中，韩兆琦认为李同是“最光辉难得的”，因为“他有思想、有见识、有气节”，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

又如《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巧用计谋，出奇制胜，大破燕军于即墨，并乘势恢复了齐国国土。田单挽救齐国危亡的非凡功绩，也得到了韩兆琦的热情赞誉。田单原是一个小小的临淄市掾，后在齐国几乎被燕军全部攻占，只剩莒和即墨两城幸存的局面下，被推举当了即墨守军的头领。他擅长攻心术，在极大限度地分化瓦解、麻痹涣散敌军斗志的同时，还能有效激发即墨军民同仇敌忾、义无反顾的决心。在做好了大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他突然使用“火牛阵”，出其不意地攻破了燕军，并趁机全线反攻，一举收回了全部失地。燕国侵略者在齐国抢劫杀戮，倒行逆施。齐人饱受苦难，憎恨不已，产生了保家卫国的强烈心愿。韩兆琦认为人心向背是田单领导的即墨之战胜负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田单才有可能大展奇才，而一举击败燕军，重建齐国”。

二是以身殉道精神。在韩兆琦看来，《史记》中的这类历史人物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人生姿态，即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宁死也不向邪恶势力屈服，孔子、孟子、屈原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们都是有道德、有才干、有抱负的人物，一心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君子固穷”，“朝闻道，夕死可矣”，“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便是他们用其浩然正气铸就的千古名言。韩兆琦指出司马迁是把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来敬仰的”，指出司马迁能“孤心独运地从历来不受欢迎的先秦儒家人物中甄拔出孟子，并为之立传”，“能从历来无人提起而被贾谊偶尔说出的故事中甄拔出屈原”，均为“司马迁写中国古代史的重大发现”。他特别指出了司马迁对这些历史人物文化人格的心向往之，凸显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以身殉道的高贵品质。

孔子、孟子、屈原等人的这种精神光芒，也闪烁在《史记》中的一些战争人物身上。比如《田单列传》中的王蠋，在齐国被燕国占领后，燕人想立他作傀儡，被他严词拒绝：“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说完“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又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鲁仲连，在秦国大军包围邯郸，魏国又派了辛垣衍来对赵国施加压力，劝使赵国向秦人投降时，他挺身而出，正义凛然地驳斥了辛垣衍的投降主义论调，断然声明：“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韩兆琦认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一股不降志、不苟活，誓与严守道义而不怕赴汤蹈火的殉道精神，因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三是忍辱奋斗精神。司马迁有名言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某些战争人物忍辱奋斗的历程，堪称是对司马迁这一生死观的形象演绎。韩兆琦指出司马迁的生死观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选择，必要时要勇于“豁出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其二，在意义不大的时候，绝不应该随意轻生，绝不能动不动就“豁出去”拼命，死得毫无意义，轻于鸿毛。韩兆琦注意到，司马迁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奋斗，前者如《陈涉世家》中的陈胜，在谪戍渔阳、遇雨失期、“法皆斩”的危急时刻，毅然选择了奋起抗争，喊出了震古烁今的话语：“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为了维护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后者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甘受胯下之辱、《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的卧薪尝胆等。忍辱发愤是《史记》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韩兆琦认为《越王勾践世家》是司马迁“表现这种主题的最集中、最光辉的一篇”。他还指出“司马迁自身的忍辱奋斗是与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所以他写作勾践复国的故事，异常生动精彩”。

司马迁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奋斗。然而该如何取舍这两者呢？太史公并未明言。熟读《史记》的该书作者指出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通过伍子胥与其兄伍尚的一段对话，其实已经寓论断于叙述之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楚平王囚禁了伍氏兄弟的父亲伍奢，并以其名义派人叫兄弟二人回去。面临同样的情境，他们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伍子胥决定挣扎着活下去，杀出重围，逃奔他国，以图日后“借力以雪父之耻”；伍尚觉得自己未来难以有大作为，遂决定束手就擒，回去陪父亲死，以求得一个忠义孝顺之名。韩兆琦指出：“在这里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他还感慨道：“尽管当时的紧急可能间不容发，但却要正确地作出有关生死的大抉择。大概‘英雄’与非‘英雄’的区别，也就表现在这里了吧！”经由他的分析，读者可以更深切地把握司马迁所揄扬的“忍辱奋斗”的人生哲学。

四是能打胜仗、不惧失败的精神。在《史记》的战争天地中充分展现军事天赋的古代名将，有孙武、孙膑、吴起、田单、伍子胥、李牧、项羽、韩信、张良、卫青、霍去病等。在司马迁笔下，孙武的吴宫教阵、孙膑的进兵减灶、田单的火牛阵、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深谋远虑、张良的运筹帷幄、卫霍的大战匈奴等，不仅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与“军事迷”所津津乐道，更是历代用兵者研究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韩兆琦在分析他们的用兵谋略与过人胆识时，多能新意迭出，发人深省。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赵国名将李牧示弱以诱匈奴：“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韩兆琦评道：“此处写将军之以弱形示人，以引敌人上钩之状，真实可信。俗语曰：‘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让敌人吃到某种甜头，敌人怎肯上钩呢？”不仅如此，韩兆琦还进而联系汉武帝时期的马邑之围作对比。汉廷埋伏三十万大军等候匈奴人上钩，而又坚壁清野，居然“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韩长孺列传》）。如此设伏，徒见愚蠢与胆怯。后来单于捉到了汉军的一名都尉，都尉怕死向匈奴供出了四周埋伏汉军的秘密，致使汉武帝埋伏三十万人的马邑之围徒劳无功。韩兆琦说：“对比之下，李牧这才是令人叹服、令人叫绝的真名将。”赞赏了李牧能打仗、打胜仗的大勇气与大智慧。

在整部《史记》中，如果要挑出两位司马迁最喜爱的历史人物，则非项羽、李广莫属。李长之说：“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还说《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最炫耀人的文章了”！韩兆琦在分析这两篇传记时，揭示了司马迁的一大创造，即“通过写‘败仗’以表现英雄的不朽”。当李广所率领汉军四千人，被匈奴的四万人所包围而濒临败亡时，李广毫无畏惧，“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以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韩兆琦赞叹道：“这是何等忠勇豪迈、何等有我无敌的英雄父子！”项羽在垓下失败后的东城之战中，以他的二十八骑对付灌婴统率的五千追兵，杀了汉军的一个将领、一个都尉、士兵数百人。他的一声大喝，能使“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项羽仍能斗志不衰、豪气不减。韩兆琦指出：“也正是由于司马迁写项羽、写李广用的手法巧妙，故而这两个失败英雄都被表现得虽败犹胜、虽死犹生。”

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韩兆琦书中对《史记》战争人物的爱国主义、以身殉道、忍辱奋斗、能打胜仗、不惧失败等精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对于当下的读者尤其是年轻官兵们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文艺评论

青春乐章（油画）

于桂元作

描摹抗疫图景　塑造英雄群像

■张　凡　何　倩

《中国作家·影视版》2020年第9期“抗击疫情剧作专题”刊发了剧作家王安润创作的剧本《大爱无痕》，讲述了新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驰援湖北武汉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组敢于担当、英勇无畏、既专业又敬业的医护工作者群像。在他们中间，有新婚前夕主动请缨的呼吸科医生茹仙古丽，有坚守岗位、忘我工作的杜可欣院长，有借一曲《黑走马》翩翩起舞、抚慰患者心灵的巴哈古丽，还有坚守“大后方”的居来提处长、负责后勤调配的工作人员，以及活跃在街头巷尾的网约车司机志愿者等等。他们虽然职责与分工各有不同，却共同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践行着初心与使命，诠释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

剧本《大爱无痕》以一个个动人细节为基础，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形象。作为一名医生，茹仙古丽“坚决要求去武汉第一线”。病人刘惠英的康复可以说是她全力以赴工作的最好证明。抗疫楷模杜可欣院长是剧作着墨较多的一位典型人物。位居关键岗位的杜可欣处处以身作则，没日没夜地奔走在抗疫第一线。他大胆实践、积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疗效。不知疲倦、高强度的连续“作战”透支了杜可欣的身体，也让他承受着远超普通人的感染风险。他高高托起人民的生命安全，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上种种，不仅让人们深刻体会到抗疫前线的危险重重、生死攸关，更让人们真切感受到那些医护工作者的勇敢精神和高贵品格，体会到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磅礴力量。

剧作《大爱无痕》在将目光聚焦在抗疫一线的同时，也将笔墨贯注在坚守“大后方”、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群体身上。剧作中，新疆某医院的韩科长在疫情发生后快速组织人员腾病房、搬病床、调配被褥和生活必需品，同时搭建起临时员工宿舍，合理分配就餐，为维持医院运营作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像韩科长这样的后勤保障人员未能置身抗疫一线、直接参与救治病患，可他们却勇敢承担起物资配送、清洁消毒、医疗废物处理、安全保卫等等琐碎繁杂却十分重要的事务，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安全有序的医疗环境。他们没有置身于聚光灯下，而是默默奉献、勇敢同行。剧本还书写了凌晨5点起床接送医护人员的网约车司机志愿者的故事，记叙了一个个无私无畏又无比坚强的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营造出一幅前方与后方紧密互动、真实鲜活的抗疫全景图。

剧作《大爱无痕》从大处立意，从小处落笔，以新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援鄂事迹为主体故事，塑造了一群舍生忘死、为民解难、敬业奉献的白衣战士形象。他们的形象和故事，生动诠释了抗疫精神的伟大，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担当和中国力量。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5分　印完4时45分